

老龄化背景下飞歌师徒传承的代际重塑与出路

杨红冰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9日

摘要

本文以L县苗族飞歌传承为例, 探讨老龄化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师徒关系的变迁。随着青壮年外流, 传承主体呈现高龄化, 传统以家族和村寨为基础的师徒纽带面临代际断裂风险。老年传承人作为技艺核心却受身体衰退与后继乏人制约, 年轻一代则因生计方式转变与语言隔阂难以进行长期学艺。飞歌逐渐从日常生活对唱转向节庆展演, 存在技艺“表演化”隐忧。然而实践显示, 师徒制正通过代际协作团队、数字媒介应用等方式弹性重构。研究表明, 老龄化既是危机也可能成为契机, 关键在于建立“养老-传承”融合支持体系, 通过政策设计将老年传承人视为活态文化资源, 在社区层面搭建技艺传授与养老照料相结合的平台, 使传统技艺在人口结构变迁中找到可持续的延续路径。

关键词

老龄化, 非遗传承, 师徒制, 代际关系, 苗族飞歌

Intergenerational Reshaping and Pathways for the Master-Disciple Inheritance of Feige in the Context of an Aging Society

Hongbing Y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pril 1, 2026; accepted: June 19, 2026; published: June 29, 2026

Abstract

Taking the inheritance of Miao Feige (Miao Flying Songs) in L County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aster-apprentice relationships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context of an aging society. As young and middle-aged populations migrate out of rural areas, the main body of inheritor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elderly, and the traditional master-apprentice

bonds based on family and village ties face the risk of intergenerational gap. While elderly inheritors serve as the core of these skills, they are constrained by physical decline and a lack of successors; meanwhil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finds it difficult to engage in long-term apprenticeship due to changes in livelihood and linguistic barriers. Feige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daily-life antiphonal singing to festival performances, giving rise to concerns over the “performative” nature of the craft. However,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master-apprentice system is undergoing flexible reconstruction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collaborative team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media.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aging can be both a crisis and an opportunity. The key lies in establishing an integrated “elderly care-inheritance” support system, which, through policy design, treats elderly inheritors as living cultural resources and builds platform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that combine skill transmission with elderly care, enabling traditional crafts to find sustainable continuation amid demographic shifts.

Keywords

Ag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Master-Apprentice System,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Miao Feige (Miao Flying Song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当今中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这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贵州 L 县的苗族飞歌，正在面临一个现实困境：掌握此项技艺的传承人大多年事已高，而年轻一代中很少有人愿意学习和继承。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当社会逐渐变老，那些依靠口传心授的传统师徒关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老一辈和年轻一代之间的传承纽带，是如何在老龄化背景下被重塑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方式，既能让老年传承人安享晚年，又能让他们的手艺得以延续，实现“老有所养”与“艺有所传”的双赢？这便是本研究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

从理论上讲，将老龄化、非遗传承和传统的师徒制放在一起观察，是一个比较新的视角。以往研究要么单独讨论养老，要么只关注技艺保护，很少把两者联系起来。这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理解文化传承中“人”的因素——尤其是那些作为活态传承模范的老年群体。而在实践层面，这项研究希望能为像 L 县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一些参考，思考如何更好地保护和支持那些年迈的传承人，同时促进技艺的代际传递，这也是响应“积极老龄化”社会目标的一种具体尝试。

回顾已有的研究，人口老龄化领域开始更多地关注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与参与[1]-[3]。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师徒制一直被视为核心传承方式[4]-[7]。不过，专门讨论少数民族地区老龄化与师徒制变迁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所依据的田野材料，也引用了音乐人类学的视角，比如梅里亚姆提出的“观念-行为-声音”模式[8]，它提醒我们，技艺传承不是孤立的，它深深嵌在人的观念和社会行为之中。这些理论为我们理解苗族飞歌的传承困境提供了基础。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将从 L 县苗族飞歌传承的老龄化现状出发，观察师徒关系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分析其中存在的现实困难，最终探索可能的融合路径。在方法上，主要依托扎实的田野调查，包括对传承人，如州级传承人 Y 和她的徒弟 W 的深度访谈，对她们日常教学与演出活动的参与观察，以及具体的个案分析等，以便于更加贴近当下的真实生活场景，捕捉那些制度与政策条文之外，生动而细微的

代际互动与情感联结。

2. 老龄化背景下 L 县苗族技艺传承的总体特征

要理解 L 县苗族飞歌的传承现状，绕不开一个基本事实：这里的老龄化趋势与技艺传承紧密交织在一起。L 县属于贵州省黔东南州辖区，人口以苗族为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推进，迫于生计发展的需求，农村劳动人口向城市流动，大量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村寨里留下更多的是老人和孩子，使得县域内苗族飞歌的生存环境较为严峻。这种人口结构直接反映在飞歌的传承队伍上——队伍人均年龄在 55~60 岁。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部分人受现代消费文化驱使而忽视本民族文化。手机、电视和互联网等新型传媒的普及，为苗族人民带来了更多的音乐体验，这些新奇的体验会使因过去生活条件差而产生崇外观念和好奇心的苗族青年们对这些新鲜、时髦的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导致本民族的飞歌在与外来音乐的竞争中流失大量的听众。于是，传承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留守家乡的老年人肩上。

这种老龄化特征体现在传承的方方面面。过去，飞歌是生活的一部分，在坡上、在酒桌、在节庆里随时响起，男女老少都能对上几句。现在，村寨里自发的、日常性的对歌活动少了，它更多变成了一种在特定节日和文化下乡活动中的展演性活动。且台上的歌者也多是中老年人。近年来，由于会唱苗族飞歌的男性人数减少，目前更多的是以女性组成的合唱队进行表演。过去苗族年轻男女经常以情歌“游方”，情歌对唱能够唱上三天三夜，而现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老一辈的记忆和演绎来维持。由此可见，传承的场域已经从广阔的日常生活，收缩到了节庆舞台和有限的培训活动中。

在笔者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部分传承人表示“身体状况已不如从前”，其中传承人 Y 提到：“现在唱高音的时候，嗓子容易哑，一场完整的对歌下来，要休息好几天。”这种生理上的自然衰退，直接影响了教学和演出的持续性。

在这种严峻的传承环境下，老年传承人就成了关键角色。他们不只是会唱歌，更是苗族文化的“活字典”。如传承人 Y，她不识字，但从小在奶奶和母亲的歌声中耳濡目染，掌握了大量的古歌、飞歌曲调，还懂得许多苗语古词和背后的典故。这些知识很难从书本上学到，几乎全靠口传心授。在现有的师徒关系里，像 Y 这样的老歌师是绝对的核心。她教徒弟 W 时，不仅是教飞歌的唱法，更是在传递歌词里的历史和情感记忆。她们组建的表演队，成为连接老一辈技艺与有限的新生力量的桥梁。在社区里，这些老一辈传承人通过教歌、带队表演，实际上也在默默维系着大家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尽管他们面临着年龄增长、嗓音变化等现实困难，但眼下，他们依然是让飞歌这门“手艺”不至于断掉的最重要一环。

传承人的地域分布也极不均衡。大部分传承人集中在县城或旅游发展较好的村寨，而在更偏远的乡镇，传承人数量稀少且年龄普遍偏高。这种分布不均加剧了传承的脆弱性——一旦某个村寨的核心传承人离世，往往意味着飞歌中承载的部分记忆消散。例如，2021 年一位 82 岁的歌师去世后，他所掌握的 17 首祭祀古歌至今无人能完整传唱。

3. 传统师徒制的代际结构：老年权威与技艺延续

在苗族飞歌被列为“非遗”之前，它主要依靠两种传统的师徒关系传承。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承。Y 就是以血缘传承方式习得的，她的歌艺是从她的奶奶和母亲处学习继承，同时她也是家族里的第五代歌师；另一则是 L 县 B 村的文氏家族，从一百多年前的文苟由，一直到 1996 年出生的文梅，整整八代人，都是通过家庭内部的口传心授把歌传下来的。第二种关系则是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传承。“那时候，唱歌是生活的一部分，年轻人想学歌，平时就跟着寨子里的老妇学，她们(老妇)唱，她们(年轻人)

就在旁边学。”学习往往就在日常劳作、绣花或准备节庆活动等日常活动中发生，这种学习没有固定的课堂，更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这种传统的师徒模式里，代际关系有几个很鲜明的特点。首先，老人拥有绝对的权威。因为他们掌握着最正宗、最完整的技艺和知识，比如那些古老的苗语歌词和曲调背后的故事。年轻人学艺，是一个单向的接受过程。其次，这种关系里充满了深厚的情感纽带，特别讲究“感恩”。就像在笔者对传承人W访谈中，她反复提到，她非常感谢师父Y“手把手”地把她教出来，认为“有她才有我的今天”。这种感情超越了简单的教学，更像是一种基于尊敬和忠诚的亲情。

这种师徒制，其实巧妙地融合了养老和传承两件事，形成了一种朴素的共生关系。在寨子里，一位身怀绝技的歌师老人，会因为他的技艺而受到全寨的尊重和礼遇。晚辈们向他学艺，不仅在学本事，也在无形中承担了照顾和陪伴的责任。传承活动完全嵌入在家庭生活和村寨的公共活动之中。老人通过传授知识来延续自己的生命价值，而年轻人则在学习和照料中继承文化与责任。这是一种没有明文规定，却深深扎根于乡土社会的互助循环，让技艺和人情在代际之间稳稳地传递下去。

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详细记录了传承人Y与W师徒之间的传承细节。她们的教学通常发生在三种场景：一是节庆前后的集中排练，每次持续3~5天；二是日常劳作间隙的碎片化传授，比如一起绣花时的随口教唱；三是演出途中的即时指导，W称之为“路上教学法”。教学的内容体系分为四个层次：最基础的是调子，其次是词歌，然后是腔，最高层次是意。Y强调：“调子和词可以快点教，但腔和意要靠悟，多唱多练，自然而然就会了。”这种分层教学体现了传统技艺传授的循序渐进特性。

4. 老龄化冲击：师徒制的转型与传承危机

随着社会老龄化，以及年轻人大量外出，这套传统的师徒制正面临着深刻的冲击和转型，甚至显露出传承断裂的危机。最直接的困境，首先体现在老年传承人自己身上。传承人是技艺的载体，但现下面临着无人传承的局面。Y随着年龄增长，嗓音条件已不如从前，这直接影响了她的教学和表演能力。此外，一些老歌师因为年迈体弱逐渐退出舞台，与世长辞。他们带走的往往是一整套无法复制的知识和记忆。县内如Y一般优秀的传承人本来就不多，一旦断层，整个传承链条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徒弟W也提到：“现在活动多，她(Y)忙不过来，有时需要我单独带队。”但她也坦言“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会”。这种依赖师父教导的传承模式，本身就充满了不稳定性。

更深层的变化，是师徒代际关系本身的结构在松动。过去那种在村寨里朝夕相处、耳濡目染的终身师徒关系，现在很难维持了。年轻人要读书、要外出打工，他们和寨子里的老人，在时空和重心上重叠不多。学习就变成在假期里的、短期的、片段式的请教，Y对此感叹道：

前年一个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嗓音条件很好)想跟我学习唱苗歌，但是不懂苗语，不能明白苗歌唱的什么内容，只能跟唱，但是不跟唱就不会，学了两三天就不来了。学习苗族飞歌的首要条件就是会说苗语。

老人所熟悉的那个充满歌声的乡土生活场景，和年轻人所处的现代世界之间，出现了隔阂。社会节奏的加快，现在的日常生活与过去的日常也已大相径庭，年轻人也无法满足飞歌练习所需的时间，故而技艺的传承产生了裂痕。

所有这些因素，都指向一个令人忧虑的局面：传承的“终结”。这并不是说飞歌会立刻消失，而是说它可能失去活的灵魂。飞歌越来越成为一种专门用于舞台和比赛的“表演”，它和苗族日常生活、以及那些具体的情感表达的联系在变弱。师徒之间那种深厚的情感与知识纽带在弱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观赏表演和参加活动的人可能不少，但真正愿意沉下心系统学习、接受传承的人却寥寥无几。长此以往，就可能出现“活动热闹，传承冷清”的局面。老人们依然是台柱，但台下，却难见能够接替他们的年轻身影。

5.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师徒制的当代重构

面对老龄化的冲击，传统的师徒制并没有完全失效，而是在实践中被重新塑造，展现出新的韧性。Y 和 W 师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Y 作为老年师父，她的角色是“传艺授魂”——她不仅教唱法，还传递那些古老的苗语歌词和背后的文化含义。而徒弟 W，则扮演了关键的“桥梁”角色。她组织排练、带队参加活动，在师父因年龄或家务不便时顶上。她们俩一个掌握着核心知识，一个富有组织活力，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合作关系，让传承在现实中得以运转。

这种重构还体现在表演队的建立上。这支队伍以 Y 为核心，吸引了一批像 W 这样的中年女性加入。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或私人师徒组合，而是一个小型的、有组织的“代际共同体”。通过参加政府组织的文化下乡和非遗进校园等活动，她们把飞歌从村寨带到了更广的舞台。这个过程对她们以及飞歌文化来说意义重大。频繁的团队活动和演出，让 Y 这样的传承人持续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不再只是孤独的“活字典”。她在教学和表演中获得了尊重和价值感，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精神养老。

同时，她们还尝试用新工具来连接老传统。Y 和 W 通过抖音发布表演视频，比如爬坡节的对唱、苗家的敬酒场面。这些视频不仅让外地打工的苗族同胞能看到家乡的歌，也吸引了陌生网友的点赞。这一举动增加了飞歌在新时代环境下的影响力，此举虽还不能完全替代面对面的教学，但这种线上展示，至少让年轻人有了个接触飞歌的轻松入口，提高了部分人因忙于生计而忽视本民族文化的兴趣。短视频成了连接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人群的新纽带，让飞歌在老龄化时代，也能发出新的声音。

表演队于 2019 年成立，在团队内部有其特殊的“以演促学”的教学模式。每次重要演出前，会组织 10 天左右的集中培训，形成沉浸式学习环境。W 说：“平时大家各忙各的，只有集训时才能真正静下心来学。”团队形成了内部的教学循环：先由 Y 编曲并通过口授和亲身示范的方式教导 W，W 学会后，二人再同时去教会团队其他成员。通过 Y 和 W 师徒二人的传授方式可以看到，这种师徒传承方式不仅能够保证技艺传承，同时，在老师带领学生参与非遗传承保护事业的过程中，学生还能够了解和学习非遗传承保护工作是如何开展，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创新非遗事业传承保护的新模式。

6. 老龄化视角下技艺传承的出路：养老与传承融合

面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飞歌传承的出路或许不在于逆转趋势，而在于找到一种新的融合方式——将养老的关怀与传承的需要结合起来。首先，在观念上，我们需要重新看待老一辈的传承人。他们不应被视为社会的负担，而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像 Y 这样的传承人，通过教歌、带队表演，始终活跃在社区中。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健康老化”，让他们在传授技艺的同时，保持社会联系，实现精神上的满足和价值感。

具体到师徒制本身，我们需要优化它，构建一种更互助的代际模式。可以尝试建立更稳定的老、中、青结合的传承队伍。就像 Y 和 W 那样，明确分工，相互支持。尤其要强化徒弟对师父的生活关照和精神慰藉，把学艺和敬老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让传承活动更多地回到村寨的公共生活里，技艺传承就能成为社区养老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形成一种温暖的互助循环。

要实现这些，离不开具体的政策支持。一方面，要实实在在地提高老年传承人的补贴，完善他们的生活保障，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去教歌。另一方面，要继续推广文化下乡以及爬坡节这类活动，为师徒之间创造更多稳定的教学机会和时间。此外，还可以探索让技艺本身产生价值，如更系统地将飞歌表演、相关的苗绣产品与乡村文化旅游结合起来，发展适合老年人的“银发经济”。当老人们看到自己掌握的歌谣和手艺能带来尊重，也能带来一定的收入时，传承的内生动力才会更强。最终，让养老的过程成为文化延续的过程，让古老的歌谣在代际的互助中获得新生。

7. 结语

L 县苗族飞歌的故事告诉我们，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是真实的，但它也可能催生出新的传承方式。我们看到，传统的师徒制形式确实在变化，过去那种紧密的、终身的村寨师徒关系变得难以维持。然而，代际之间那种互助与感恩的精神内核，并没有消失。Y 和 W 的合作，表演队的运行，乃至一条条短视频的传播，都证明了这种生命力可以在新的土壤里扎根。

因此，未来的路或许在于将两个目标融合在一起：既要推动“积极老龄化”，让老人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也要坚持“活态传承”，让技艺在真实的生活和代际互动中延续。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保护歌，更要保护唱歌的人，保护他们传承的环境。把养老的支持体系和传承的激励机制结合起来，让社区重新成为滋养文化的土壤。

说到底，手艺的“终结”与否，关键不在于有多少人把它记在名录里，而在于它是否还能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与生活。只要还能找到让老人发光、让青年接力的方式，只要歌声还能从心底响起，这份穿越时间的礼物，就依然有机会在变迁中传唱下去。

参考文献

- [1] 郇宜飞.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人社会参与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1, 32(13): 292-294.
- [2] 翟绍果, 张紫嫣, 张瑜芫. 中国特色“银龄行动”的发展变迁、实践逻辑与创新路径[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5(3): 122-132.
- [3] 朱可欣, 向涵, 彭霞霞, 等. 湘西民族乡村空巢老人文化参与机制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2, 33(14): 143-145.
- [4] 桑德诺瓦. “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理念与实践方法[J]. 中国音乐, 2008(2): 29-38+2.
- [5] 赵艳喜.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J]. 贵州民族究, 2009, 29(6): 49-53.
- [6] 李爱真, 吴跃华.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论[M].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1.
- [7] 韩东. 黔东南音乐类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和利用[J]. 中国民族博览, 2017(4): 19-20.
- [8] 艾伦帕·梅里亚姆. 音乐人类学[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0.